

# 论郑观应对孙中山的影响

——兼论孙中山的洋务思想

尹全海

郑观应(1842~1922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正翔,号陶斋。他是在“买办故乡”长大的。其叔父郑廷汇(秀汇)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同宗哥哥郑济东乃宝顺洋行之职员,著名买办唐廷枢是郑家的姻亲,曾寄圃和徐润则是郑家“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如此家事和境遇给年幼的郑观应很大的影响。1858年16岁的郑观应因“小试不售”,毅然弃学从商,离开家乡赴上海从贾,而且学有所成,他先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作买办,继而跻身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之高位。三十年间,他关心时政、热心西学、举办洋务,宣传维新,终因与洋务官僚政见相忤,屡遭纒纒,1885年,因买办杨桂轩亏款事件,郑观应遭他人陷害,羁留香港半年之久,后获释遂闲居澳门,归隐港澳。

孙中山(1866~1925)比郑观应小24岁,系郑观应之香山同乡,两人早年有相同的经历,在同一环境下度过了“性格形成的年代”。郑观应“自幼从海泊遍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sup>①</sup>,熟悉洋务。孙中山12岁就到檀香山,“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眼界大为开阔,“自是有慕西方之学、穷天地之想”。1885年郑观应闲居澳门期间,孙中山正在香港读书,并时常往返于香港、澳门之间,对郑观应

早已心向往之、无限钦慕。1890年,孙中山经香山好友陆皓东的介绍与郑观应相识,两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两人不仅在学习西方,富强救国等问题上有相同的主张,而且在中西医学方面也有共同之好,据说郑观应这一时期编辑付梓的《中外卫生要指》,即系两人合璧之作。郑观应的言行及对时局的主张,常常引起孙中山的共鸣和极大兴趣,给孙中山留下极深印象。反映孙中山早期思想的《上李鸿章书》,就明显的受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影响。

## 二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两者都描绘出一幅“富强救国”的蓝图。《盛世危言》自序有云:“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术,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收,保商务,使货畅其流”,<sup>②</sup>《上李鸿章书》亦称:“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全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物畅其流——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sup>③</sup>。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的“四大纲”,在《盛世危言》中均能找到相同的论述。

《上李鸿章书》关于“人能尽其才”的论述，基本上是对《盛世危言》、《学校》、《考试》、《西学》、《教养》等篇核心内容的概括和提炼。《盛世危言》的《教养》篇倡言：“横览环宇各帮，其国运之隆替，莫不关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教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强调培养人材关乎着国家生死存亡之大计。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主张，要做到“人能尽其才”，必须“教养有道”。所谓“教养有道”，就是使“庠序学校遍布中国，人无贵贱皆有所教”，与《盛世危言·教养》篇中的主张完全一致。《上李鸿章书》中关于“人能尽其才”的其他两项主张：“鼓励有方、任使得法”，其实质与《盛世危言》的《学校》、《考试》、《善举》三篇的要旨基本吻合。

《上李鸿章书》关于“地能尽其利”的论述，明显的受到《盛世危言》《治河》《旱潦》、《农功》、《开矿》诸篇的影响。孙中山把“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三者作为“地能尽其利”的标志，而这三个标志，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早有论述。《农功》篇开章即盛赞西方诸国，“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为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民心不明以官牖之，民力不足以官辅之，民情不便以官除之。西方各国的农部其职责是总揽宏要，各省设立农艺博览会，具体负责农耕。郑观应由是建议当局，户部应设置一位专责“总理农务”的侍郎，“参仿西法以复古初”。其具体办法是：派专人到西方各国，学习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堵为腴的办法，编著成书，晓于国人。每省再派藩、臬、道、府之精练者一员为水利农田使，责成各牧令于到任数月后，将本属地之农情详细考

察，因地制宜。并且把各级官员对本地“土田肥瘠若何，农耕勤惰若何”，作为该官政绩考课和升迁的主要条件。如此等等，与《上李鸿章书》大同小异。应当说明的是，一部分人认为《农功》原本是孙中山所著，后收录《盛世危言》中。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即根据冯自由和戴季陶的说法，把《农功》收为孙中山的作品，如此处理有两个问题很难回答。一、《盛世危言》中的确收录不少别人的文章，但均列入“附论”之中，并注明文章的出处和原作者姓名，据夏东元教授统计，《盛世危言》共收“附论”三十篇，均有原作者姓名，为何《农功》一篇没有呢？显然不可能。况且以郑观应当时的身份地位和政治品德，也决不会公然窃夺邑人之作。二、《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还特别提到“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这件事。“孙翠溪西医”即是孙中山，以此介绍笔法论之，决非出自孙中山亲笔。因此，《农功》肯定为郑观应之作品无疑，孙中山因受郑观应的影响，在《上李鸿章书》中表达出相同的内容，亦在情理之中，并无悖理之处。

《上李鸿章书》关于“货能畅其流”的论述，来源于《盛世危言》的《铁路》《邮政》、《商务》、《厘捐》、《税则》等篇。《税则》篇中，郑观应鉴于当时洋货纳税轻，而华商纳税繁且重，造成“洋商获利，华商裹足”的局面，提出“裁撤厘金，加倍关税，保护华商”的政策。要求政府重新订立新的通商法则，仿效西方“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恒从轻”，从而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郑观应又在《厘捐》篇中痛陈中国关卡林立，捐税繁多之弊，他说“近来内地局、卡林立，往往数十里

之遥，其间多至数卡，过一卡有一卡之费，经一卡抽一卡之厘，商贾倍受盘剥，怨声载道。”郑观应提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是：“凡商贾经过之要卡，既完厘后发给凭单，所经分卡见凭单一体查验放行，不得重捐”，如此即可解商贾之苦，便于发展商业，富国实民。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把郑观应的论述概括为“关卡无阻碍，保商之有善法”，并以此作为“货能畅其流”的先决条件。

如上所论，《上李鸿章书》关于“物能尽其用”的论述，是孙中山对《盛世危言》中《纺织》、《技艺》、《驿站》、《修路》、《电报》等篇的概括或阐释。

当然，《盛世危言》中的许多内容，在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中是找不到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富强救国”的途径。《上李鸿章书》认为：“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就是说，只要实现了以上四者，就足以达到“富强救国”之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则认为：“四者既得，多未透彻”，还必须“速立宪法，改良政治”。明确提出了“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的政治观点。改良中国政治的药石是在中国实行议院制代替封建的君主制。这一点郑观应和孙中山的主张又明显的不一致。孙中山只主张以发展实业来“救国”，郑观应则主张，只有改良政治才能发展实业，不改良政治，实业断不能发展，更谈不上救国。

第二，关于对清政府弊政的抨击，《上李鸿章书》没有《盛世危言》激烈。比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吏治》篇中，痛责清朝官吏“如蛇蝎，如虎狼”、

上腹国计、下剥生民”。而《上李鸿章书》的通篇口气都相当温和，最尖锐的地方也只是谈到“关卡之滥征，胥吏之多弊”云云。如此言语，在当时朝野大臣的奏折中是随时可以找到的。

### 三

郑观应虽厕身洋务近三十年，但他的政治主张和当时洋务派官僚有很大的分歧。洋务派官僚举办洋务、学习西方，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训，只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不学其政治制度。郑观应视其洋务派是“遗其精义，而袭其毛皮”、“舍本图末”。他认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固然重要，但这毕竟不是本，而是末。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思想才是中国人学习的根本。用郑观应自己的话说就是：“欲攘外，亟欲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郑观应把“改良政治”作为“富强救国”的最终动力，足见其不是一般的洋务派，他既是一个熟谙洋务的官员，又是一个颇具爱国思想的维新人物，他既有洋务思想，又有维新思想。通过《上李鸿章书》和《盛世危言》的比较，可以发现，孙中山只吸收和接受了郑观应的洋务思想，而没有接受其维新思想，应该说孙中山此时的思想内涵尚属“洋务”范畴。

认为《上李鸿章书》反映了孙中山的洋务思想，并非荒谬之论，而是有史实依据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的“四大纲”，所涉及的都是些“快舰，民车，邮电、火械”以及“泰西之语言文字，夫算地輿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属于西方文明中最表层的东西——即物质范畴，是洋务派官僚所学习的内容，即船坚炮利。无怪乎六十年代就有人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 略论孔子的军事思想

宋 广 梅

我国春秋时期,是齐、晋、宋、秦、楚等五霸并立的时期,其他弱小诸侯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注重国家政权的建设,因而都把治军打仗,研究军事理论提到了自己的议事日程。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孔子,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儒家思想原则,提出了以礼治军的政治主张。今年9月28日,适逢孔子诞辰2542周年纪念日,本文拟对孔子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作以探讨,作为对这位文

化先哲的纪念。

### 一、礼之序,君之柄

作为一个国家,为了政局的稳定,国家的安宁,必须要有礼,并坚持以礼治国。在中国古代,礼首先是制约人们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的。同时,它还包含了许多典章制度、组织纪律和法律原则。西周至春秋时期,“礼者,君之大柄也”,也就是说,礼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为封建

时所条陈之主张“大都不出洋务范围,尚未具体言及变法维新,遑论革命排满”。

④再者,孙中山把李鸿章作为上书对象,不仅是因为李鸿章权倾朝野,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且是因为李鸿章“以兴办洋务闻名于当世”,⑤是著名的洋务派官僚,执洋务派之牛耳者。如果孙中山上书的内容和李鸿章的洋务思想背道而驰或者根本就不粘边,无疑是自讨没趣,这一点恐怕28岁的孙中山是很清楚的。孙中山只所以敢上书李鸿章,是因为他的上书内容符合李鸿章的口味。

从孙中山年轻时与李鸿章、郑藻如、郑观应、王韬、盛宣怀、何名等人的关系和思想联系看,孙中山确实交往过一批很有影响的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洋务思想不可能对孙中山没有影响。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以前,曾两次上书当道郑藻如、李征庸。郑、李二人都是洋务官僚,这一史实也可

以说明他与洋务派的关系。

我们承认孙中山在青年时代的洋务思想,只能说明孙中山是从洋务派走向革命道路的,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之称号。事实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不可能都是经过改良主义走向革命道路的,复杂的文化环境和特殊的社会条件,会促使人们从不同的道路踏上革命坦途,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

### 注

① 吴尹全辑《待鹤山人事略》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均不注。

③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一)8页,以下均不注。

④ 邱捷《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及策动李鸿章“两个独立”新探》。

⑤ 张磊《一个巨人的外向门户和活动方案》。